

# 抗日史料征集工作拾零

## 本刊资料组

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九一八”侵占我东北领土之后，又把魔爪伸向华北，于1937年7月7日，终于在芦沟桥燃起了罪恶的战火，妄想吞并全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召唤下，纷纷投入抗日救国行列。当时主要文化事业单位如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主要工作，随着战略转移，相继迁往内地，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图配合抗战，不因战火而中断收藏，密切与联大合作，并与联大共同组成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专事蒐集、编辑抗战史料，以配合抗日救国大业。

史料会成立之初，即明确分工，北图任采访，联大任编辑。但据现在所见北图旧档，很少关于史料会的完整的材料，仅在个人记事本中，能发现点零星素材。从这些零星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北图工作人员为搜集抗日史料煞费苦心之一斑。爰就编录所得，略加整理叙述，或可为对北图这段历史的补充。

### 一、在“后方”征集抗日史料工作：

在“后方”（昆明、重庆）的史料会，征集工作进行尚较顺利。北图负责人以国共合作政治新局面的出现为契机，向中国共产党代表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提出申请，请求支援蒐集抗日史料工作。得到周恩来同志和驻陕办事处林伯渠等同志的热情支持，给予这项工作以极大便利，亲自交代和亲笔函复寄下了一批批珍贵的革命文献与抗日史料（参见本刊1981年第3期篇首7页）。至今北京图书馆新善本库内收藏的新善本中，凡盖有史料会图章的，都是那时所收的珍籍。略举其中抗

日史料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4》、《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论三个阶段》、《坚持河北抗战与巩固团结》（彭德怀）、《抗战中的政治工作》（罗瑞卿）、《吴玉章抗战言论集》及《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抗战二周年特刊》和《联共党史》等珍籍当时都得直接正式公开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另外，北图还与延安新华书店、延安解放社、延安新中华报社、新华日报社等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出版机关建立了经常订购书刊业务，按期订购《解放》、《中华》、《新华日报》、《解放周刊》、《新中华报》等报刊。还收到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为日寇疯狂轰炸重庆，报社被毁改版发行的通知，和《新华日报》发行敌后版征订的通知。这些革命书刊和抗日文献，为当年的北图开辟了难得的书源。

上海办事处一位采访抗日史料的馆员记事信稿中还载有北图以图书馆协会名义编印了一本《图书馆及文化机关被毁纪实》，他信中建议把此书分赠上海各报，予以转载。另于其他信稿中载有北平图书馆编有《抗战期中之国际舆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二、在沦陷区蒐集抗日史料工作：

当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本部（1939年3月10日教育部明令昆明办事处，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本部）把这项工作，交给驻上海办事处的一位馆员来做。该馆员的本职工作原是调到上海科学社分编该社的外文书刊，兼任搜集抗日史料工作。处在敌占区，既要与馆领导取得密切连系，又要冲破敌伪封锁禁运，才能得到所需的资料，转寄内地。综观他个人

记载材料，其工作特点是：

(1) 凡不在日伪“禁例”的刊物，即以上海办事处名义征订。如为抗日史料会订到淪陷区报纸十余种（包括《申报》、《文汇》等）；从照相馆买到《战事照相册》；购到“维新政府”所出的《实业月报》（内有“维新官吏”（汉奸）合影多张）及其他有关中日战争的书刊，均随时寄转昆明。

(2) 通过熟人关系，进行实地调查。如托求伪教育部职员，前往原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查看该馆被毁情况，了解到该馆被日寇盘据，悬有《日支图书文献整理馆》门牌，门前有日军守卫，不得进入。并从《大美报》刊载的日方消息，证实原地质调查所全部藏书，都被这个“整理馆”所接收。

(3) 紧跟抗日统一战线新形势，与当时党政军机关取得联系。如原记载信稿中说：

“……日前得晤中宣部（国民党）驻沪秘书某君，承允介绍往晤外商华字报负责人及市党部（国民党）、共产党部、与新四军及游击队联络员等，对各处所发宣言、传单及秘密刊物，或可获得一部。又如在另一函稿内介绍说：“外文报纸有《华美日报》等六、七种，其中《译报》、《导报》系共产党机关报，编制尚佳。……”随即收集到《译报》（自创刊至239全份）寄港转内地。

(4) 与外国驻华使馆报社各方取得联系。如为征求“外人投资损失调查”材料，英使馆派副领事回访答称，英参赞处表示赞同，对此秘密文件，俟请示本国批准后即可照赠。另如美国参赞赠与《中国贸易报告月刊》（China Monthly Trade Report, 1937—1939.）托德人Dr·Read征到《中国文化情报》13期及受赠《华美晨报》，《大英夜报》《大○晚报》等报纸。

(5) 与图书馆、图书馆服务社、各书店（包括日本内山书店）联系采购或转购。如访知上海大通市馆搜藏有沪战期内各刊物，传单及宣传品全套，即抄寄目录，请馆

本部选定。托环球书报社转向日本内山书店购买日文书报；托宁波某书社代购“禁书”一、二十种；托图书馆服务社代购日文书、年鉴、杂志报纸等22种。另如伪满及大连满铁会社出版物也在征集之列。

(6) 托上海工部局（租界）教育处负责人代为征求各救济机关团体文献。

(7) 未注来源征得书刊有：《沪上新刊抗战书籍》，日本画册、《事变纪实》，沪战期间的《救亡日报》（郭沫若同志等主办），《上海十种小报联合发刊》（自创刊至停刊全份），《战时日报》及各种传单、宣传品、军用手票，伪币伪印花等实物多种（包括日寇所发的“大东亚新秩序”传单宣传品）。还有1934年《外交年鉴》、《海关条约》《暴日侵华》等书。《暴日侵华》一书（商务版）曾寄香港多部转给内地各军政学机关。

上述资料，是仅见于信函的一部分，至如每次寄往香港书包所附书单，已无凭查知。这些资料，大都是根据馆本部提示或请准后蒐集的。凡一书一刊一物，往往是经周转才能取得，而寄往中转站香港办事处，更须按照资料性质决定邮寄或托带。邮包曾有过被检查扣留情事，至托人带港比较重要之件，则从未发生过遭遇留难或危险损失等事故。迨至太平洋战起，香港淪陷，唯一渠道堵塞，这项工作，遂被迫中止。

今逢北京图书馆开馆七十周年纪念之际，据此零金碎玉回顾这段历程，虽是它七十年历史长河中一派小小支流，而且事过四十余年，似乎已成陈迹，但它为时虽暂，毕竟是一段不平坦的路程，遇到一些荆棘坎坷；同时由于当事人的努力，北图这一时期藏书并未因而受阻，而且初步接触进步思想，以革命的珍籍，丰富了馆藏；以抗日史料，教育了人民。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一定作用，因笔之于书，以为纪念。